

序 言

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由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 以后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两汉之际 佛教传入中国 与中国的固有文化相融合 逐步形成了中国的佛教 被史家称为儒释道三教之一。近代洋教传入中国后 人们又把它与天主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并列 称为中国五大宗教。古老的儒家则被视为一个学派。

对于什么是佛教 赵朴初先生曾作过解释：“佛教 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 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组织等 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去。”佛教的基本教义是 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苦”的原因不在社会环境 而由每人自身的“惑”、“业”所致。“惑”指贪、瞋、痴等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惑”、“业”为因 造成生死不息之果 根据善恶行为 轮回报应。故摆脱痛苦之路 唯有依佛教的经、律、论三藏 修持戒、定、慧三学 转变自己的世俗欲望和认识 超出生死轮回范围 以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 叫做“涅槃”或“解脱”。这些说法 包括在“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三法印”、“三世流转”、“六道轮回”等基本教理之中 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小乘佛教主张自度 大乘佛教不仅要追求个人解脱 而且要“普渡众生” 使芸芸众生都能“转迷成悟”、“离苦得乐” 得到解脱和自由。佛教的这些道理对旧社会许多受苦受难的人们是有相当吸引力的 所以千百年来 佛教在我国虽然经过多次盛衰 仍能流传不息。同时 佛教有较强的适应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 它自身也不断变化。在社会主义时期 中国佛教协会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 发扬农禅并重、开展学术研究和对外文化交

流等传统 以及它所倡导的‘五戒’、‘十善’、‘六度’、‘四摄’等伦理道德观念 对于止恶行善、净化人的心灵、净化社会、建设精神文明等等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当然 也不必讳言 佛教与其它宗教一样,既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积极因素,也有与其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所以广大宗教工作干部和宗教研究人员的任务 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党与政府宗教政策法规的指导下,通过多方面工作 积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 发扬积极因素 自觉地克服消极因素 使之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安徽是佛教的重要流传地区之一。如果从公元三世纪僧会抵吴京译经布道 吴大帝孙权为其建寺算起 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历代都有不少名僧在这里建寺布道 讲经说法 几乎各个宗派都在这里留有踪迹 禅宗、净土宗更为源远流长。特别是省内有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金地藏垂迹之地,又有禅宗二祖慧可、三祖僧璨的道场 所以信仰佛教的人比较多。现在 全省有全国重点寺院 14 座,省级重点开放寺院 52 座,一般寺庙 280 余座 僧尼 1400 多人 信仰佛教的人难以数计。省和不少市县都建立了佛教协会 还有禅学研究会、金地藏研究会等民间性佛学研究团体。

本书作者张轼同志是一位参加抗战的老兵 在长期做统战、政协等工作的过程中,与宗教界人士广交朋友,对佛教史比较熟悉,特别是对九华山佛教文化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勤学善思 笔耕不辍 曾先后编著出版了《九华山简史》、《九华山史话》、《古今诗家咏九华》等著作。近几年来 他虽年逾古稀 除积极参加禅学研究外,仍不辞辛劳 八方奔走 广泛搜集资料 撰写出这本洋洋十几万言的《佛教与安徽》专著 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安徽佛教发展的概况。作者在资料搜集、内容剪辑、结构布局和文字提炼等方面都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全书纵看是一部安徽佛教发展史 横看则是一个

多侧面、多层次的安徽佛教画面 特别是其中的《禅宗与安徽》、《名僧行藏》、《诗书画僧简介》、《护法研佛话居士》等等章节的设置都是富有新意的，一些附表也有补遗作用。我认为这是一本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很有价值的书 值得一读。

我是佛教的一个门外汉，对佛教历史和佛教知识都知之甚少。作者以“不耻下问”的精神把书稿送来广泛征求意见 并要求我写一篇简短的序言。我反复拜读之后 增长了不少知识 确实受益匪浅。但写序之事 自感才疏学浅 愧难承当 所以几次想写都未敢动笔。后来 经张老一再催促 在这位可尊可敬的古稀老人仍然笔耕不辍 著书立说 继续为社会做贡献的精神感召下 只好不避浅陋，不揣冒昧，把自己阅读这本书稿后的一些很不成熟的见解写出来，作为序 向读者推荐 同读者交流。不妥之处 尚望读者批评指正。

张秉纶

1995 年 1 月 2 日

第一章 中外文化交流与佛教之传入

人类有史以来 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经济的、文化的)总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相互仇视与战争在历史长河中则是短暂的。在阶级社会出现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即每一次战争(侵略与反侵略)的爆发,都与某一国家统治集团的政治目的相联系,但强国只能攻占其领土,而无法征服其民心的。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即有反英的鸦片战争和反日的抗日战争。

当然战争结束了,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又会慢慢恢复起来。这时除官方的交往外,民间的经济、文化(包括宗教)的交往更为活跃。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除道教外,现有宗教多从域外传入,其中最早者当为佛教。而传入方式多以学术为先导。其目的则在于以宗教意识来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它在各民族间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的,即汲取对己有用的成份,为我所用;这往往也成为历代统治阶级自觉与不自觉的行动。一旦在其感到对己不利时,又会借口它为“舶来品”而加以排斥和打击。

从区域间来看,宗教方面的交往,多是先近后远距离地进行着;从程序上看,多是先民间后官方地展开。旧的史学界出于正统观念,又往往以与官方间的交往为分界线,例如天竺(今印度等)和我国毗邻,其佛的传入,史籍上只承认汉明帝永平初(公元60年)派使者赴天竺、请沙门(出家者)得经像、立白马寺译经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实际上,早于东汉之前,它在我国西部(古称西域,邻近印度的少数民族地区)已陆续传播开来。这不妨从早期来汉族地区译经的佛教学者的名单中去求得证明。

下面先从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概况谈起。

1·1、外籍学者·来华译经

早期佛学的传播方式 多为个别外国教徒云游山野 向少数汉人口头传播少数佛经 影响微弱。到东汉永平初 中天竺学者迦叶摩腾 又称摄摩腾、竺摄摩腾 应邀到洛阳专事翻译佛经 所译五部经 今仅存《四十二章经》 传播宣扬小乘教义 被称为“汉译佛经之始”。此后 在官方文书中也开始使用佛经中的翻译名词 如浮图、桑门、优婆塞等。出现在文人笔下 则被视为一种时髦。

桓帝(147—167 年在位)初 有安息国(今伊朗)太子安清 世高 让位其叔出家后来华 于洛阳、仓垣等佛寺译经多种。灵帝末中原大乱 安遂南游。

灵帝 168—188 年在位 时 又有安息国居士安玄 曾以功拜骑都尉 与汉学者严佛调于 181 年共译《法镜经》、《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等多部。

在此期间来华从事译经的外籍学者还有 天竺沙门竺佛朔、月支 今新疆及印度一部分 沙门支娄加忭、康居 今新疆北境及乌兹别克部分 沙门康巨、康孟详等 陆续译经十余部。

三国以前汉译佛经具有那些特点？

- 1、由政府出面聘请外籍佛教学者来两京译经；
- 2、从译经数量、质量来讲 量少(卅余部)质低。属直译派。
- 3、从译经的内容来讲 主要属于小乘毗昙学 只在支恢 178—188 来华后始将大乘学说传入。

4、三国时 魏吴等地也有译经活动 均为聘请外籍沙门 如魏之康僧铠、吴之康僧会(?—280)支谦等。译注 611部(858卷)。总之 不可否认“(佛法流东土 盖由传译之勋”而安徽首由学者严佛调参预，乃佛史一个特色。

1·2 中国僧众 出国游学

所谓佛教的传入 最初实际上只是对佛经的传译 且当时的出版条件未备 从梵文译出的经论 全仗虔诚僧徒的手工抄写 读到者极少 信仰者自然也少。那么 我国在何时才出现佛教徒的 据传 汉朝法律规定 不许汉人出家 所建寺院专供外籍僧人居住 东汉明帝时特许阳城侯刘峻一人出家 这被说成是“汉人为僧之始”。直到魏加平初 (249) 始由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在洛阳被特许设立戒坛行授戒度僧仪式 而真正准许成批汉人皈依三宝、成为佛教僧尼的还是两晋以后的事。西晋时名僧竺法护，通晓西域卅六国语言。译出佛经最多 计 154 部，但仍不能满足佛学研究者的需求 于是陆续有些僧徒自费出国。其中较早赴天竺游学的有竺法护、宝云、法显、智严、智羽、智猛、康法朗等。而以法显游学时间最长 (14 年) 游历邦国最多 五天竺卅余邦国，对情况了解的也最深 被誉为五世纪中国旅行家和翻译家。东晋末则有名僧鸠摩罗什的译经活动 首创意译派 对佛学传播贡献至巨。南北朝时续赴天竺 瞻仰圣迹 采觅遗经 者仍源源不绝 刘宋慧览 (达磨弟子) 道普、道泰、智猛、昙纂等先后出国。其中以智猛结伴而行的人数为最多 计 15 人) 旅途最艰险 病死途中者也众 然而收获也不小 (得梵本经籍数十种) 最后终于回国 住凉州)。

北魏 道药、慧生、宋云等也先后赴天竺。其中道药是在太武帝初西行取经 遍历五天竺 数年始归 而慧生则是孝明帝时奉敕赴天竺 留学数载 携回大批佛典 110 部 而归。当时大家既学梵文、梵语 也将汉文化带去 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媒介。

进入唐代，到天竺去礼佛取经者亦甚活跃，其最著者如玄奘、义净、慧超、玄照、道琳等 (详后)。

宋代值得一提的是太祖乾德 (964) 初 曾诏选沙门三百人去天竺留学，东京天寿院沙门继业为入选者之一，直至开宝 (976) 间始

学成归来。适值太祖驾崩 太宗初立 继业等诣阙呈上所获梵典舍利 即被授以衣号。诏“听各僧自择名山 由官府立寺奉养终身。”继业择峨眉修行 曾撰有《西域纪程》 后被范成大在其遗物中发现，始公诸于世。

综上所述 我国早期僧侣赴印 先为游学、礼佛 后始为取经、留学 先为自费 后始为公费。他们赴印之动机是什么 似多为信仰因素，其中也有学术因素。诸如：

1、对以往直译佛经量少质低不够满足。如“汉语训诂 靡不精奥”(慧琳)译语不规范 学习起来颇感不便。所以彦琮提出译经要“八备”。

2、对部份译经产生怀疑。东晋名僧道安等都曾撰有《疑经录》，提出有些经要重译。

3、部份佛经的观点与我国世俗传统的观点（如儒家的忠孝仁义等）相矛盾 僧侣中有意为调和之倾向 如道安有容许慧远引《庄子》来解释佛典 而听其不废俗书的故事）

以上问题，都希望在赴印游学中求得解决。

1·3、中外学者同场译经

我国自两晋以来 为汲取外来文化“营养”翻译之风气渐开，然翻译佛经仅靠懂得汉语的外籍学者的个人奋斗是不够的，还必须和懂得外语的中国学者的协同才能完成。因此 这里便有个译经机构和译经场所等问题。

对此，不妨回顾一下我国译经历史。

- 1、从东汉到西晋以前，译经以聘请外籍学者为主，汉人为辅；
- 2、东晋、南北朝时期 国家处于分裂状态 各地官府与大寺也有译经活动 汉人仍处“配角”地位；
- 3、唐宋时期 朝廷办起正规译经院 译员大增 规章制度逐步建立健全。

从译经院译员班子的配备情况来看，宋初成立的传法院颇具代表性。据说“太宗崇尚释教，置译经院，后改称传法院，开太平兴国寺”得西域僧法天及天息灾、施护等取所献梵书加以翻译。

根据天息灾的建议，译场内设有：

- (1)译主(主持译务)宣读梵文。
- (2)证义(协助译主)评量梵文。
- (3)证文，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
- (4)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汉字，犹是梵音(音译)。
- (5)笔受，翻梵音成汉音。
- (6)缀文，同缀文字，使成句义。
- (7)参译，参考两国文字，使其无误。
- (8)判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
- (9)润文，参详润色。

从历代译经情况看，汉人参加译事者渐增，其中较著者约有：汉代的严佛调、西晋的竺叔兰、帛远、聂道真父子、东晋的竺佛念、僧肇、僧睿、道融、道生(世称“什门四圣”)、道安、法和、法显等、南朝宋的慧观、宝云、僧猗、道泰、齐梁时的法云、法泰、慧恺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译院中虽属配角，但对中外文化交流都做过各自贡献。尤以龟兹国沙门鸠摩罗什首创意译派，所译经论质量颇高，对中国佛教发展影响至深。其中他译的三论成为三论宗后来立宗主要经典；《成实论》流行于江南，成为成实学派立宗的主要经典；而《阿弥陀佛经》又是净土宗立宗所据的三部经之一。由此可见译经活动为中国佛教后来的创派准备了条件。

同时还应当指出：上述学者不仅在译场辛勤笔耕，而且还从事研究，对某些佛经作过注疏和讲述，对佛教中国化作出过各自的努力。

1·4、中国高僧 独自翻经

如果说 隋代以前汉译佛经主要是由政府 或大寺 延聘外籍 (如印度) 学者来华进行的话 那么入唐以后 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 即我国学者开始由配角逐渐转为主角。

唐代帝王多数崇道容佛 中晚唐时则由容佛转而扶佛 佛教有了一定发展。佛教内译经和研究佛经的空气较浓, 思想非常活跃, 学派与宗派纷纷出现 除较早出现的天台宗(南朝陈智顗)华严宗(南朝杜顺)三阶教 隋唐间信行创立 外 唐代创立起来的有:

- 1、吉藏(549—623)的三论宗(学派);
- 2、道宣(596—667)的南山律宗;
- 3、玄奘(602—664)的唯识(法相)宗;
- 4、善导(613—681)的净土宗(莲社);
- 5、善无畏(637—735)的密宗(东密、藏密);
- 6、慧能(638—713)的禅宗(佛心宗)。

其中道宣的律宗、善导的净土宗在盛唐都较盛行 楞伽宗则在安史之乱前一度兴起, 而慧能创立的禅宗只是在安史之乱后开始崛起 其他各宗大抵于“武宗灭佛”后渐趋衰落。

唐代各宗中有哪些佛教学者曾从事独立译经活动的? 其规模人数又较之以往有何不同?

从东晋至唐代 中国佛教内曾涌现过“四大翻译家 即鸠摩罗什(晋)真谛(南朝梁陈间)玄奘(唐)义净(唐)。

唐初 太宗诏聘中天竺沙门波罗颇伽罗密多罗来长安译经 令名僧慧乘、慧净、慧颐、法琳等十九人助译 由大臣房玄龄最后勘定 但历时三载 只译经三部(35卷) 而汉人独自译经应以玄奘为代表。玄奘早在留学期间即“名满五天” 回国后唐王曾“欲劝其还俗给官” 未成 乃令其主持译经事务。在译场(弘福寺、慈恩寺内) 时间长达廿年。在其周围集合着一批佛教著名学者 如宗哲 唐初

“十大德”之一)道宣、神泰、慧立、辨机、玄应等。其弟子窥基是其得力助手,创立法相宗,从事译著,号“百本疏主”、“慈恩大师”。

继玄奘之后的翻译家是义净,主持译场亦长达十余年。其周围也聚集着一批佛学家,其中名声较著者有法藏(华严宗创始人,号“贤首大师”和“康藏国师”),法宝、灵辨、嘉尚、苑咸等。

玄奘圆寂后,还有个别外籍沙门,如日照来华译经,但数量不多。

对历代译经,前人曾有评述,诸如:

论三国前的译经是:“梵客华僧,所言揣意,方圆共鉴,金石难和”(所谓直译)。

论魏晋时的译经是:“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所谓意译)。

论东晋南北朝后中印交往增多,译经是:“后则智猛(法显亲往)、玄奘,不控两通,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赞宁)。

据史籍载,历代译经数目如下

东晋前汉译佛经计 611 部(858 卷);

南朝时译经累计 2162 部(4328 卷);

隋朝时译经累计 2257 部(5310 卷);

唐时译经合计 1258 部(5390 卷 • 贞元释教目录)

宋朝载目计 6197 卷,都收入《大藏经》。

元以后译经极少。

1.5、中国名僧 走出国门

印度在十世纪唐末时,佛教日趋衰落,但传入我国后恰似枯木逢春,经与我国传统思想相溶合而逐渐走向中国化。同时,也将我国老子五千言(即《道德经》)由玄奘等一批佛道学者的努力,译成梵文,传入印度等国。当时东亚邻邦(日韩)不时派人来华学习经

教 而我国名僧也不断应聘出国布道 其中有：

1、唐三论宗论师福亮于显庆（656—661）间应聘赴日本传法；名僧智由于乾封（666—668）间应邀携指南车赴日；名律师鉴真于开元间应日本国王之约赴日本传戒；开元末（736）又有名律师道璿、佛彻赴日本传戒。

2、南宋禅僧普宁，于景定（1260—1264）间应聘赴日，专为圣福寺整理禅规，数年后始归。

3、元代名僧一宁（？—1317年）住普陀山，号妙慈弘济大师，曾任江渐释教总统（僧官）。大德初（1299）奉旨赴日考察佛教，抵日后被日本留充西京南禅寺寺主。精通释典、百家之学、善书法。延祐（1317）寂，日方追赠为国师。

4、明代曹洞宗龙象、南京天界寺方丈道成（永乐初，1404）奉旨赴日本宣化，越年归。

5、清代名僧兴俟（心越）清初应邀赴日本传法，日人为立寺居之。

上述历代诸僧赴日后，多将中国所立之宗派及其教义传入，因而对该国各宗派的形成曾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本章资料来源：

- 1、《释迦方志》；
- 2、历代《高僧传》；
- 3、《唐代佛教》等。

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唐太宗三遣王玄策访印

贞观年间(643)，唐太宗为答谢印度戒日王的进贡，特派大臣李义表及右率府长史王玄策赴印报聘（即回访），增进友谊；三年后戒日王驾崩，其权臣篡立，王氏奉旨再次率吐蕃（今西藏）等兵马入印；为友邦平叛；论功太宗拜玄策为朝散大夫；高宗时为安抚五天竺，第三次派玄策赴印。

在王氏第二、三次赴印过程中，不辱使命，曾集录了天竺各邦国的乐章、医卜、经像、典籍以及农业科技情报，供朝廷利用，发挥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积极作用。

第二章 从宗教管理方面看历代帝王对佛教之态度

纵观古今中外 每个国家不论它属于那个阶级专政 都会遇到一个怎样对待宗教的问题 并相应制订其宗教政策。历史上世界各国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有两类，即政教合一（教权兼管政权）和政教分离（教权不干预政权）。我国建国前 除西藏地区外 实行的都是政教分离制 不仅教权不得干预政权 而且各教还应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政权的监督管理。当今世界上多数文明国度也莫不如是。对宗教进行管理 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那种认为对它毋须管理 任其自由泛滥的观点 不符合我国的历史实际 显然是不可取的。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1、法律定位与遍设僧官； 2、译佛经派大臣参预； 3、佛寺修造须严格审批； 4、设坛度僧时严时宽； 5、谋反、干政一律镇压。

2·1、法律定位 遍设僧官

1、从独尊儒术到三教鼎立 自西汉地主政权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 儒学在我国思想领域内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儒术成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精神支柱。儒释道三教 家 座次的排列在唐初经过了反复的较量（如“议三教谁先”“僧尼要否”“致敬父母”？）最终才由武则天（691）确定下来，即后来出现的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从此在我国二千余年历史长河中便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 即每位帝王尽管有着其民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但他们在执掌政柄 巩固政权的基本方法上 总是万变不离其宗——用儒术培育人材 治理天下。修文偃武 办学堂、开科举 沿“学而优则仕”的老

路从儒生中物色各类治国人才。在这里不妨让我们介绍几位历史上有名声的帝王：

梁武帝是位既崇道又信佛，号称佛心天子的佛门弟子，本该“看破红尘”不恋利禄，抛开王位，过山林生活，但他却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活到八十多岁也未让位。在位时仍沿用儒术，修文教，设谤木，止贡献，执掌政柄，并未全按佛教方术治国。

北魏孝文帝系少数民族，自幼崇佛，亲政后建少林寺，设译经所，为佛门所推崇。自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汉化，在其本民族内禁着胡服，禁说胡语，重用汉人儒生，办学堂、订礼乐。总之遵儒术治国，统一了北方。

唐太宗是位颇有作为的帝王，信仰神仙，取容佛态度。为巩固其家天下，曾向其大臣们说：“倾心释教，为亡国遗风。”并列举“梁武父子好佛老，以致亡国，秦皇汉武好神仙，服丹药，致早身亡。”在谈及自身时则坦然相告：“己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由此足见，这些帝王虽有民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别，但在利用宗教巩固政权这一点上却是殊途同归。

2、设僧官，实行政教分离。从东汉至晋，佛教的活动，一般以译经、讲说为主，寺少僧寡，势单力薄。对佛教要不要进行管理和如何管理，还未提到当时朝廷的议事日程。当时接待外籍佛教译经学者的专门机构——鸿胪寺早在东汉已设立。那么，提出对僧尼必须进行的管理并设立机构，委派僧官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据说最先实行这一举措的是后秦国王姚兴（395—415年在位），四世纪末，他任命僧弼为国内僧正（秩同侍中），协助朝廷管束僧众。此后，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依例设机构，委僧官，毫不含糊。如北魏立有监福曹（后称崇玄曹），南朝齐梁时立同文寺，隋立昭玄寺，唐立司宾寺，宋立鸿胪寺，元立总制院（后叫宣政院），明立僧录司等，且多委任效命朝廷之名僧主持之。至于僧官的职称，历代多大同小异。继后秦称僧正之后，北魏、北齐称僧统，又有沙门

统、都统、大统等名目)南朝齐梁时又叫僧正、大僧正 隋循北制,称僧统、大统 唐称左右街僧录 宋承旧制 间有僧录、僧正之称 元称院使、释教总统 明代僧官名称陡变 在善世院内设左右善世 秩六品)左右阐教 从六品)左右讲经 八品)左右觉义 从八品) 凡僧官都必须经礼部考试合格后充任。同时在各地也配有僧官,管理比较严。

为什么历代帝王都重视设宗教管理机构、委派一批僧官?这不妨先听听佛门自己的声音 按《僧史略》的描述 是由于僧众多缺乏法的观念“如马无辔勒 牛无贯绳 渐染俗风 将乖雅则”因而他们极赞成朝廷加强对僧尼的管束,以求得在尘世的生存权。

然而,从握有政柄的统治者看来,为什么要进行宗教管理?他们既不准臣民们乱说乱动,更不准聚众造反,对佛教当然也绝不会例外。历代帝王对佛教基本上有“三防”即(1)防聚众谋反;(2)防干预朝政;(3)防逃赋税、徭役的伪滥僧尼。为此,他们不断强化僧籍管理 明令僧尼名册需三年申报一次 发牒)力图抑制其势力的增长。然而 在遇到战乱频仍 民不聊生的年代里 大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穷苦百姓,为逃避徭役和赋税的重压而依附于寺院,或为僧 或为假僧 祇户)或为奴 佛图户)这便是产生上述伪滥僧尼现象之根源。

2·2 翻译佛典 大臣参预

1、历代译经概况 在国际交往中,为排除民族间的语言障碍,翻译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据《汉书》记述 朝廷当时即设有译官,名译官令、译官丞 隶属鸿胪寺卿 为接待外宾服务。翻译又分为口译与字译两种 这里主要谈谈译经。东汉永平间(公元 60 年)印度沙门迦叶摩腾等应聘来华译经 是为译经之始 也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之始。此后陆续来华译经的著名学者有安清 世高)安玄和三 支 支干、支遁、支谦 等 称直译派。所译佛典量少质低。东晋时鸠

摩罗什来中原聚众译经 称意译派 译经量渐增 对在我国佛教形成发展 影响深远 隋唐间即有人以其所译经论立宗创派 如三论宗、法华宗、华严宗等)并先后传入海外。罗什与真谛、玄奘、义净则被后世尊为佛经四大翻译家。入唐 译经渐渐走上正轨 成立了译经院 (场)分工也较明确。经玄奘、义净等人数十年间的努力 新译佛典数量大增 计 1258 部 5390 余卷。其中以玄奘贡献尤巨。因他精通梵汉二种语言文字 已无语言障碍 故著名学者刘轲说：“自大教东流 翻译之盛 未有如 玄奘)法师者 ”。

2、译经派大臣参预 魏晋南北朝时，外籍沙门来华译经者较多 而且活动形式基本上只有两种：一为朝廷聘请来的 二是少数大寺或方镇的雇请。当然以朝廷开办的译场最为正规 因它不仅有一批专业人才 而且经费充足 时间也持久 所译经籍也渐增 尤其是唐宋时期。当时帝王对佛教态度在译经方面也有反映 这里且以唐太宗对玄奘的态度为例 唐初 太宗奉行的是容佛策略 但又有倾向性 在前一节里已有简述。太宗即位之初 玄奘以一普通僧人申请出国留学 未获允准 遂自费出游 十六年后在印度学成载誉归来 备受朝野尊崇。太宗出于以儒术治国的动机 曾力劝其还俗给官 玄奘婉拒 太宗无奈 乃转令其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 以人尽其才。

对佛教的译经活动 历代帝王是否就很放心 这就未必 且以下列为例：

唐初 高宗屡派中书令、右相李义府 614—666 兼充任译场润文使 进行监护勘定工作 后在玄奘等译场任过润文使的还有大臣于志宁、李林甫、来济、许敬宗、蒋元超、杜正伦等。这期间思想较为活跃 在朝野都有反映 除前述论“三教谁先”“僧尼要否”“致敬父母”外 士大夫间则有有神论 如唐临著《冥报论》等 与无神论 如林披作《无鬼论》等 的议论。这或许是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贞观之治”的一个侧面吧？

宋代继承唐制 在译经院多以丞相衔带译经润文使。据说宋代每于“ 圣诞前两月 译经院开堂 ”之时“ 宰相领润文使、参知政事一员同润 经 文 ”。太平兴国间 在译经院任过润文使的有汤悦、张洎、赵安仁、杨亿、李维、晁宗懿等。天禧间则由宰相丁谓、王钦若等为译经润文使。但在这些大臣中多数并非“ 通晓蕃 梵 语、通汉文语义 ”之翻译人才 而仅是秉承帝意监护译经之干材。对此 唐人早有察觉：“ 欲达皇情译语初 ”。总之 历代译经活动离开帝王的意志可能性不大 这是由于历任译经润文使的大臣们都有所谓“ 检校佛法 清肃非滥 ”的任务。隋唐诸帝四次查禁三阶教 指斥《三阶杂法》(经论)为“ 异端邪说 ”即是一例。

2·3 佛寺修建 严格审批

佛教建筑物 自古以来其名称较多 如寺院、招提、兰若、庵堂等。其经费来源约有四 朝廷或方镇拨款 朝臣与官吏舍宅 僧尼募化所得 其他方面 (如家庙)但以其中建筑规模大、僧侣众 法器全 并取得朝廷赐额者始得称寺 绝非任何僧俗都可随意营造和自行命名的。可是，历代帝王为何又允许各地佛道创立寺院道观？《魏书·释老志》上一语道破：“ 何必纵其盗窃 故资营寺观 ”让僧道有个安身之处。

对于佛寺必须赐额问题 前人曾指出：“ 梵宇必须请额于朝廷，而后始可称为寺 未请额者其建筑虽极宏丽 亦只可称庵。此朝廷之旧制 不容私僭者也。”什么叫寺额 即书有寺名之匾额。大家知道 寺院的多少是衡量佛教势力强弱的主要标志 故谁欲建新寺都要逐级申报朝廷批准。凡违背此项古制(法律)必予严究。明代皖籍名僧憨山即因犯有私修寺庙罪而被充军雷州半岛。但佛教为扩大生存空间 于是与朝廷展开了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唐初 太宗一方面允许建十余所新寺，一方面又敕令清查隋末的伪滥僧尼。玄宗即位初 曾下诏停建寺观 拆并小型寺庵 禁止民间铸像、写经，